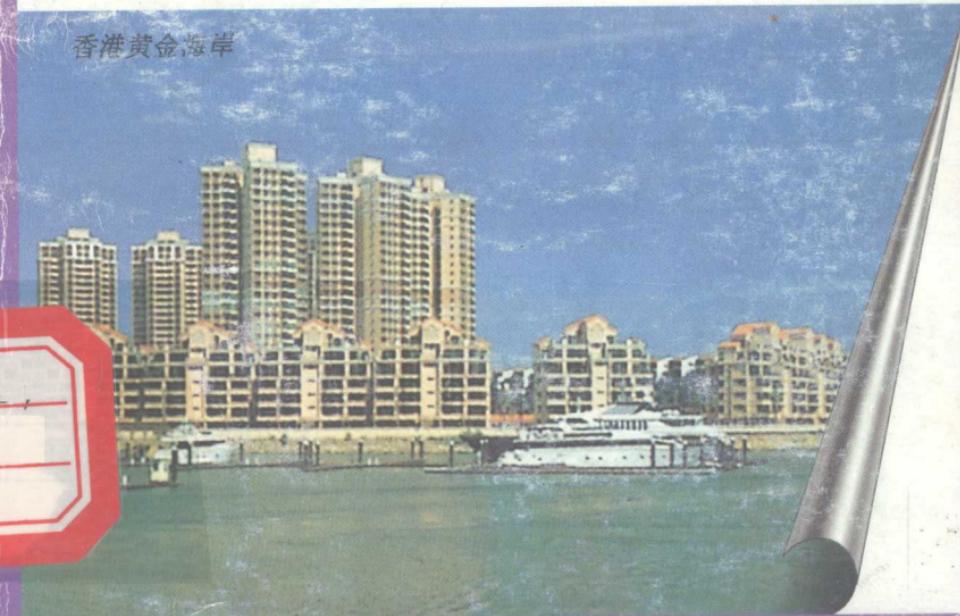


中外名人小传·第 10 辑

戴高乐小传

广东旅游出版社

香港黄金海岸



中外名人小传 · 第 10 辑

戴高乐小传

兰春华 刘禄山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

粤新登字 08 号 · 中长名入人小卦

责任编辑 邱江生

封面设计 章 雯

著者：王春山 编著

中外名人小传 · 第 10 辑

戴高乐小传

兰春华 刘禄山 编著

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中山一路 30 号之一 邮编 5106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中外合资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1092 毫米 1/32 70 印张 1100 千字

199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

ISBN7-80521-852-8/K·122

定价：80 元（全 20 册）

目 录

一、立志为国复仇的少年	(1)
二、聪明勇敢的年轻军官	(3)
三、平淡的军人生涯	(5)
四、从逃亡到凯旋	(24)
五、十六个月的国家元首	(64)
六、“打倒坏体制”	(74)
七、“幕间休息”	(81)
八、抱负在暮年实现	(85)
九、戴高乐言行小辑.....	(104)

一、立志为国复仇的少年

1890年11月22日，夏尔·戴高乐诞生在法国里尔的一个教会学校文学教师的家庭。

当时，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1870年的普法战争使法国一败涂地，继之巴黎革命、保皇党与共和党的十年斗争、共和党内部党派纷争不息，政治丑闻接二连三的发生，所有一切表明了法国作为一个世界强国正处在江河日下之中。而在此时，法国的宿敌德国却蒸蒸日上，国势昌盛、气势咄咄逼人。1888年登基的新皇帝威廉二世年轻气盛、斥退了年老保守的俾斯麦，开始谋求扩张德意志人的生存空间，“争夺阳光下的地盘”。

夏尔·戴高乐的祖上是中下层的贵族，到他父亲这代已是家道衰微，时运不济。但他的家庭团结和睦，文化品位很高。他的祖母是个文学家，伯父是个科学家，父亲是个教师。父亲治家严格，按照19世纪末中产阶级和中下层贵族的传统习惯来培养小戴高乐，向他灌输虔诚的天主教义和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他19岁进入军校之前，他主要是接受教会学校的教育。

1897年，7岁的戴高乐被父母送去比利时安多

益教会学校读书，学习拉丁文、德文、希腊文。小戴高乐对学习毫无兴趣，上课心不在焉。但他却有良好的学习能力，他的记忆能力相当好，可以将一些单词顺背、倒背如流，但就是不愿学习正课。当然他有他自己的爱好：他喜欢看惊险小说、电影，喜欢背诗、听音乐，还乐意花大量时间去写诗。因为玩皮、淘气，经常挨父亲的责打。母亲曾想要他学钢琴，以培养他勤奋的精神，但没有成功。他喜欢听音乐，但对弹钢琴不感兴趣。

直到十四岁，小戴高乐的心思才转到学习上来。为了考圣西尔军校当个军人，戴高乐开始听从父亲的劝告，利用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刻苦学习，很快成为班上的引人注目的优等生。刻苦学习正课之余，他爱好历史，选修了钢琴，喜欢幻想的性格仍然没变，儒尔·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是他最喜欢的课外读物。同时他仇恨德国的情感在继续发展，不断地升华。1905年，15岁的戴高乐在作文中虚构了一场法德战争，在战争中，法国的“统帅”戴高乐率领法军将德军打得惨败，法军大获胜利之后，庄严地收回了自己的领土阿尔萨斯。

小夏尔学业进步，身子发育良好，拔节似的生长使他很快与成人一样高了。他喜欢与自己矮一截的同学争论，而且还有几分幽默的天分，不久他便

成为一位当然的“领袖”。
1907年，17岁的戴高乐到比利时的安托万教会学校去完成中学学业。一年后回巴黎，进入斯塔尼斯拉斯学校就读，准备圣西尔军校的入学考试。

1909年8月，他拿到了圣西尔军校录取通知书，他人生的第一个崇高的梦想变成了现实。

二、聪明勇敢的年轻军官

按法国军事制度规定：报考军校的学生在正式读军校之前须在军队中服役一年。1909年10月，戴高乐进入阿拉斯的第33步兵团接受训练，先做勤杂活如削土豆皮之类，学打背包，做清洁扫地工，日复一日的军事操练，培养吃苦耐劳的精神。服役期满时，他已升为中士。此后两年，正式在圣西尔军校学习军事理论知识。1912年10月1日毕业，他入校的考试成绩在同期士官生（211名）中名列119名，毕业成绩名列13名。他的同学对他很有好感，但他的一位教官对他不感兴趣，对他下了这样一个结论：“除身材颀长而外，余皆平平。”事实证明这个教官缺乏远见。

戴高乐在军校期间最大的变化是：在读军校初期他与同学相处十分融洽，游戏打闹十分随便，很

喜欢也很会开玩笑；慢慢地，同学们觉察出他的冷淡和孤高。原来他有意地开始陶冶自己作为未来领袖人物落落寡合的情格。他在练习本上摘录了维克多·雨果的一段话：“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以此为自己的座右铭。他在许多场合的即席演讲中，使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年代日期，使人听得目瞪口呆。尽管他在 1912 年仍然登台表演杂技节目，但大家逐渐将他看成是一个严肃的青年人。

毕业后，他又回到当年曾熬过一年低贱的见习生活的第 33 步兵团。这时他已有少尉军衔。该团的新任团长就是后来成为元帅和维希政府首脑的菲利普·贝当。由于两人对枪炮等现代火器的重要性看法相同，戴高乐很快就受到贝当的青睐。一年后便晋升为中尉（年仅 23 岁）。此后，两人友谊不断加深，身居高位的贝当时时袒护戴高乐，直到 1938 年两人决裂。但他们信守了“君子绝交无恶言”的信条，对立以后的双方互不泄露共谋、知交和秘密关系。这也算是历史上一对奇特的知交。

1914 年 8 月，法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戴高乐时年 24 岁。战前，他写道：“法国将经受住巨大考验，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有一天能解放祖国，而我找到了这样的机会。”无疑他将战争来临视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时刻到来了。

在四年多的战争中，他表现勇猛，先后三次负伤：1914年8月15日在比利时境内的迪南右腓骨负伤；1915年3月10日在香巴尼的战斗中再次负伤；1916年3月2日他所率领的第十连被全歼，他受伤后被俘，一直被关押到战争结束。期间在1915年3月晋升为上尉，1916年获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受全军通令表彰，说他“在激战中以身殉国”。实际上，他伤后于凡尔登被俘。在被关押的两年多的时间里，他曾五次企图逃跑未遂，德军五次将他转移了关押地点，最后将他关押在因戈尔施塔特第九号城堡，在这个城堡他结识了后来成为红军元帅的图哈切夫斯基。

三、平淡的军人生涯

自1918年12月，戴高乐回到法国。从这年开始到1937年漫长的岁月中，他从一个部队转到另一个司令部供职，平平淡淡。他深入研究军事领域各种问题和欧洲形势的发展，发表很多有见识的见解，但却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也一直得不到提拔。

1919至1921年应募去波兰服役。在波兰军事学院教授战术学，并参加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1921年4月，已31岁的戴高乐从波兰回国渡假，在

加来与当地有名的饼干制造商的女儿伊冯娜·旺德鲁喜结良缘。

据当时人回忆，伊冯娜·旺德鲁原是决意不嫁给军人，只是因为戴高乐能够长段长段地背诵古诗人罗斯唐的诗句，并能说个来龙去脉，他的博学多才和惊人的记忆力终于使伊冯娜改变主意。两人喜结美满姻缘。

同年10月，戴高乐奉调回国，在母校圣西尔士官学校任战争史讲师。在这个位置上，他那演说家的才能初露锋芒。他的博闻强记，口才伶俐，使他讲起课来娓娓动听、滔滔不绝，折服了所有的听众。但他有自己不利的一面：身材过高，体形不雅，姿势呆板；此外，他的声音古怪，虽然发自心窝之处，却极其嘶哑，听起来象一个未老先衰的人咯咯地干咳。他自己很快意识到这点，努力改正自己的缺点，利用这个新职给他带来的实践机会，逐步塑造自己独特的姿势，把自己的声音训练得能够运用自如，无论用来发号施令、劝解说明，还是挖苦讽刺，都具有使人无法抗拒的力量。有人说，后来人们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里听到的戴高乐的声音和在法国电视里看到的戴高乐的形象基本上是在圣西尔那年形成的。

此外，戴高乐性格逐步向刚强发展，他开始表

现得落落寡合，自以为是，绝不服输，毫不认错，几乎使他周围的人难以忍受。如果说十年前他是有意陶冶自己的“领袖性格”的话，到他30岁出头这两年，他的这种性格基本上定型。

1922年11月，已经做了父亲的戴高乐考入法国陆军大学（军事学院）。在陆军大学学习期间，他结交了几个朋友，但在二战期间都与他分道扬镳，加入维希政府，站在他的对立面。他与校长穆瓦朗上校格格不入，刚入校就产生了矛盾。校长主张战争中先由司令官制定最详尽的计划，尔后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下属都要坚持按计划行动。而戴高乐认为，下一场战争是坦克战，机械化程度的日益提高意味着将来的战争是运动战。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戴高乐结业时的战术实践考试。1924年6月17日，戴高乐在考试中“指挥”兰军，他率领高度机动的地面部队将“敌人”打得溃不成军，充分证明了穆瓦尔校长消极防御理论的错误、自己理论的正确。考完后，穆瓦尔向戴高乐提问，而戴高乐却不屑一顾地让战术演习中的一名下属去回答。穆瓦尔恼羞成怒，大声呵斥：

“我问的是你——戴高乐！”

戴高乐泰然自若地回答：“杀鸡焉用牛刀。夏托伊厄（下属），请你回答上校的问题。”

在结业评分时，所有评委包括戴高乐得罪过的副校长都认为：他有无可否认的优秀品质——记忆力非凡、知识渊博、作风果断、判断形势的能力迅速。但穆瓦尔校长等多数认为：戴高乐“自命不凡”、“不听批评”、“难与共事”、“不愿与人商讨事情”。评委一致否决给他“优秀”，校长等大多数人主张给他最低等“尚好”（勉强及格）。主持考试委员会的副校长是位不计私仇的人，坚持给他一个中等“良好”，但势单力孤。僵持不下的时候，贝当元帅从外地视察归来，对此进行了强有力的干预，坚持给戴高乐评个“优秀”。他认为，给一个雄心勃勃很有希望但性情急躁的年轻人不好的评语是不妥的。最后，校方勉强给了一个“良好”。这对戴高乐的前程蒙上了一层阴影，本来他一毕业就可以调往总参谋部第三局（计划局），可以将自己的战术战略思想付诸实践，那么法国的历史就是另外一种结局，所以说这个评语不仅影响到戴高乐的命运，其实也影响了整个法国的命运。如果从那时起，戴高乐的机械化运动战的战略思想付诸实施，30年代的法国军事力量就不会在德国军力面前黯然失色。戴高乐听到他的结业评语的内容后，竭斯底里地叫骂：“军事学院那些狗娘养的！不当上校长我就不回这个鬼地方！你们瞧着吧，我不给它来个大翻个才怪呢！”

军事学院毕业后，因一个二等的评语，他不能去他梦寐以求的总参谋部第三局，只好到第四局搞运输供给。几个月后被派往美国兹莱茵区法军司令部供职。自信智力过人的戴高乐对自己去管供给运输的差使深感屈辱。但他很快就以苦为乐，化不利为有利，化无为为有为。他发现新职清闲，有很多余暇时间；再者他的部队驻在德国，这可以让他有机会在自由的条件下重新研究德国人民。在美莱兹茵的几个月内，他把自己在一战中被监禁时写的狱中日记拿出来修改、核对，充分发挥最早由埃斯蒂安将军提出来的机械化战争的观点，写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内部的倾扎》。皇逊武因·思恩史记书中系统追述了他在德国身隐囹圄的遭遇和在波兰供职的经历，描述了他对斯拉夫人的细致观察和对俄国人举止的亲身体验，说明了他对德国崩溃的深思熟虑的见解。而且还设计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的法国花园”。这是他第一次将自己的机械化战术思想加以理论化的表述。当时读过这本书的人一致认为作者目光敏锐，切中时弊。但没有引起很大的反响，书的发行量不大，再者人们刚刚从战争的恶梦中醒来，愿谈战争的人不多。夏尔·戴高乐仍是个无名小卒。

这个无名小卒的命运不济，但雄心不减。有一

次，一个叫沙文的上尉对他说：

“老兄，我想对你说些也许会使你高兴的话。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好象你注定要干出一番大事业。”

戴高乐凝视着远方，平静地回答：“是啊，我也有这种感觉。”

1925年10月，他的救星，时任最高军事会议副主席、法军三军首脑的总监贝当委任他为办公室的幕僚。这种任命对一般人来说是喜从天降，但对戴高乐来说是件苦差。他的主要任务是写军事研究报告。而要他写的报告，不能表述他自己的运动战术思想，因为他是司令部的官方理论家，他必须奉命去为他历来反对藐视的静止防御的理论去寻找历史根据，证明错误的权威理论的正确性。但这样违背自己意愿和真理的工作还是做得相当出色，令贝当元帅相当满意。

在这段任职期间，贝当让他开心了一回。贝当亲自下命令给陆军大学的新任院长埃兰：“你在学校组织一轮讲座，由戴高乐主讲。给他的评语太荒唐了。讲座由我来主持。我要把那几位教授先生教训一顿。他们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

这样，从1927年4月7日起，戴高乐这个二等生威风满面地在母校连续三次作报告，由贝当元帅

亲自押阵，整个陆军大学的教授、学生领导都毕恭毕敬地听这个“差生”讲话。

每次元帅在埃兰将军陪同下抵达会场时，教授们竟相后退给元帅闪开一条路，而元帅却让戴高乐先行；戴高乐身材高大，脸色冰冷，全身戎装登上讲台，然后慢条斯理地摘下军帽、佩剑和白手套，开始表演。米贝当作为主持人，从来有话直说，开门见山：“诸位，戴高乐上尉要阐明他的观点，请大家注意听。”

第一次讲题是：战争行动与领袖人物。他在报告中含沙射影：“强有力的人物往往严厉粗暴，难以相处，甚至使人讨厌。即使绝大多数人私下承认这样的人物是超人一等的，从而有意无意给他们以应有的评价，但他们也往往不得人心，而且在以后的生涯中也很难受到宠幸。那些决定别人命运的人宁可重用讨人喜欢之徒，也不愿提拔具有真才实学之士。”这段很显然说的是自己，引起了听众的极大反感。

第二次的主题是：“领袖人物的性格”和“纪律的含义”。他说：佩利西埃将军接到拿破仑三世的电报连看都没有看就装到口袋里，虽然违抗了命令，却为法国打赢了一场战争，并为自己赢得了公爵的爵

位和元帅的官杖；利奥泰元帅在1914年置上级命令于不顾，反而为法国保住了摩洛哥。反过来说，不知道违抗命令的将军不是好将军。

第三次讲的是：“威望”。他说：“事实上，有些人自从出生之日起就具有权威的气质，这种气质视之不能清楚见其形，但其影响则往往令人惊讶不已。”“首先一点，无神秘感就无威望可言，因为过于熟悉就不能引起尊敬。主在仆前非英雄，神居深庙方显威。因此，无论是运筹规划，还是处世和思维方法，都要令人捉摸不透，引起人们的好奇心，打动他们的心弦，使他们跃跃欲试。这并不是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对下属不理不睬，令人无法接近。恰恰相反，要想征服人心就要体察人情，使人人觉得自己受到器重。但是在这样做时，对人们决不能过于迁就，因而必须保留某些随时可以抛出来的惊人秘密。这样大家的信任之心就会油然而生，办事就无往而不胜了。”

出席听讲的军校教授和学生深感羞辱，一个小小的上尉，一个成绩不如己的二等生竟敢如此没有礼貌，毫不掩饰自己的狂妄自负、大放厥词，他们愤慨、怒不可遏，但有元帅在场，只得硬着头皮听，只能表现自己的厌烦，无可奈何。

戴高乐有一种报仇雪恨的感觉，一定程度上感

到一箭之仇已报，但一鸣惊人的愿望却没实现，反而招来更大的敌意，未免沮丧。他深信有贝当在就有晋升的希望、远大的前程。1926年，他的名字列入晋级名单。1927年晋升为少校，受命指挥第十九轻步兵营，驻防特里尔。就任时，虽然情绪低落，但还是暗下决心，决意凭自己指挥的一营人马干出一番事业。他严于治军，一丝不苟，要么搞演习，要么又是体育竞赛，常常召集部下听自己演讲。他戴着干干净净的白手套，将贝雷帽往右偏，这样，他的所有部下都不得不将贝雷帽往右歪，改变了以前往左偏的传统。他倔强的性格、独立的个性使他不断地遇到麻烦。一次他公然违抗命令，擅自决定急行军，蓄意破坏军纪；一次他处罚了一位议员的亲戚，拒绝按上级电文指示将这位议员的亲戚放回法国；1928年底，凛冽寒冬降临法军驻德国的莱茵后，气温下降到零下摄氏25℃，莱茵区的法军因流感有一百四十三名士兵丧生，而戴高乐指挥的第十九营死于流感的人最多。所有这一切倒霉的事都因贝当元帅的庇护，化险为夷，逢凶化吉。但有一重笼罩在戴高乐全家心头的凄惨阴影是贝当驱除不掉的，1928年这个凄凉的冬天，伊冯娜生产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安娜，是个残疾的白痴，戴高乐夫人给朋友的信中倾诉了自己的痛苦：“只要安娜能跟别的